

庐

山

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

风

云

谢春涛 著

1959 年 庐 山 会 议 简 史

谢春涛 著

庐
山
风
云

(京)新登字 083 号

特约编辑:祝新刚

责任编辑:潘 平

封面设计:刘 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谢春涛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1

ISBN 7-5006-2350-X

I. 庐… II. 谢… III. 庐山会议(1959)-史料 IV. D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290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75 印张 2 插页 215 千字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13.80 元

60DA-8 / 12

引 言

1959年7、8月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开始时的主题，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但后来，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向，变成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最终，揭出了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一起历史冤案。

虽然，庐山会议只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直接批判和处分的也仅仅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几人，但其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却是重大和深远的。

政治上，使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员干部受到了错误打击，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助长了说假话、虚报浮夸的恶劣倾向，导致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急剧发展。

经济上，打断了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经济

建设的巨大损失，带来了连续3年的严重困难。

理论上，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等同于阶级斗争，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党的同路人”等观点，将此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进一步发展到人多地制造阶级斗争，为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依据。

因此，庐山会议绝不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普通的会议，而应看作是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肇始，是“阶级斗争”由党外转向党内的发端。7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这里找到政治、经济、理论和体制的根源。

庐山会议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是十分显著的。研究这一课题，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中国政治有着积极的作用。它有助于理解肆虐当代中国20余年、并且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仍时有抬头的“左”的错误的危害及根源，有益于认识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加强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总之，研究庐山会议，有利于总结、借鉴历史的教训，防止和避免再度发生过去的悲剧。

同建国以来中共党史上的其他诸多问题一样，对庐山会议的学术性研究，也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开始的。10多年来，虽然陆续发表、出版了一些文章和书籍，披露了部分文献和资料，但总的说来，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与其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还不相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公布的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在已有的一些有关出版物中，资料不很可靠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又占了较大比例。因此，很有

必要继续对庐山会议进行研究。

研究庐山会议，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资料条件。近年来通过多种方式披露的有关文献资料，已使庐山会议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了其真实的面目。特别是历经劫难幸存下来被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和《张闻天选集》，以及庐山会议的另两位受害者黄克诚和李锐近年来的回忆性著作《黄克诚自述》和《庐山会议实录》，为了解、研究庐山会议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基于上述考虑，我决定写一本关于庐山会议的小书。想从这场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付出沉重代价，给彭、黄、张、周等人带来巨大灾难的悲剧中，尽量挖掘出一点不该被轻易遗忘的东西。

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和个人能力方面的原因，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因此，恳切地希望朋友们多多提出批评意见，以使我日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将其修改得更接近写作它的目的。

目 录

第一章	前 奏	(1)
一	对反冒进的批判	(1)
二	1958年的“三面红旗”	(15)
三	八个多月的初步纠“左”	(24)
四	经济困难和各方反映	(30)
第二章	基 调	(41)
一	登庐山	(41)
二	十九个问题	(49)
三	“神仙会”的讨论	(58)
四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68)
第三章	上 书	(77)
一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77)
二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89)
三	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105)
四	张闻天的长篇发言	(117)
第四章	转 向	(140)
一	毛泽东的突然反击	(140)
二	转变态度和立场	(156)
三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169)
四	“不仅对事，也要对人”	(176)
第五章	清 算	(185)
一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185)
二	“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	(195)
三	对彭、黄、张、周的批判	(206)

四	追逼“军事俱乐部”	(215)
第六章	定 案	(225)
一	下结论的“批判文章”	(225)
二	彭德怀等人的检讨	(233)
三	全会决议及公报	(237)
四	“第五次路线错误”	(244)
第七章	影 响	(252)
一	“反党集团”成员的遭遇	(252)
二	全国范围的“反右倾”	(270)
三	更大规模的“大跃进”	(276)
四	个人崇拜及“左”倾理论的发展	(283)
结 语	(297)
主要参考论著及文献	(302)
后 记	(305)

第一章 前 奏

一 对反冒进的批判

研究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便不能不讲到在此之前已经受到严重损害的中共党内民主和“大跃进”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要讲清这两点，又不能不先提及 1956 年的反冒进及其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后所遭受的严厉批判。

1956 年的反冒进，是在毛泽东批判了邓子恢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久后进行的。1955 年春夏，针对农村因合作化工作过快过猛和 1954 年多征购了 70 亿斤粮食所导致的紧张状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确定的“停、缩、发”的方针，邓子恢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工作进行了整顿和收缩，暂时停止发展，并解散了一批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但是，1955 年 6 月，在确定 1956 年农业合作社发展计划问题上，邓子恢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毛泽东主张，1956 年的发展计划在现有 65 万个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130 万个。邓子恢则坚持原为毛泽东提出、并由中央作出正式决定的发展到 100 万个的计划。

对此，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

题》的报告中，指责邓子恢被“胜利吓昏了头脑”，“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认为这场争论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分歧”。邓子恢的意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所作的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结论中，又一次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

他还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像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还把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意见正式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是破坏党内民主的严重事件。仅仅因为在工作问题上坚持与最高领导人不同但为中央所正式认可的意见，便受到严厉的指责和批判，并被定性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果和影响绝不仅仅是邓子恢及其所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更重要的是，从此形成了毛泽东个人可以随意否决其他领导人意见乃至中央集体决定的不正常局面（1943年的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曾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定权，但此前他基本没有滥用过这个本不该有的权力）。两年以后，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之所以轻而易举地遭到否定和批判，4年以后，彭德怀等

人之所以因为一封信和几次发言便被打成“反党集团”，不能不说其中有着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在组织方面产生的恶劣影响。

另一方面，批判邓子恢事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不可低估。它不但直接导致了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急躁冒进错误，进而促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急速完成，遗留了很多问题，而且，还严重滋长了党内在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第二篇序言中指出，农业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现在，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而是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批判和克服“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思想，指出凡是办得到的，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并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任务和多、快、好、省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还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①

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必然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影响。1955年底和1956年初，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1967年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达到10000亿斤和10000万担的任务，照此要求，粮、棉的产量每年必须以8.7%和10.4%的速度递增。接着，1956年1月10日至2月7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按照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和农业长远规划的要求，制订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出了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钢、煤、粮食、棉花和基本建设投资分别比1955年增长15.9%、19.7%、11.5%、61.4%、16.8%、9.2%、18.3%和68.1%的高指标。^②此后，各地区、各部门在制订计划时又层层加码，致使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信贷突破计划、原材料和机器设备供应紧张、基建规模过大等混乱局面。

对于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周恩来等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是发现较早、并及时采取了纠正措施的。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③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对1956年的一些高指标进行了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④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8、9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⑤6月4日，在刘少奇主持的研究、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草稿）》的党中央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据此，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

马。^⑥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根据李富春、薄一波的意见，确定按5%的比例削减国家预算，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减至140亿元。他还强调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因此，这次人大会议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⑦6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7月以后，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得到了中共八大的通过和批准。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又在《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为会议所接受。会后，陈云根据这一方针，主持制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总结冒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以及要实现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思想。^⑧

对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的举措，毛泽东是一直有自己的

不同看法的。这一点，他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说过，基本建设多花了几个亿，农业贷款多了一点，招收工人多了一些，可以批评，调整一下就是了，但是不应该反冒进。不过，尽管对反冒进不满，毛态度的公开表露，还是经过了一个从没有公开反对到提出委婉批评直至严厉批判的过程的。对于这一变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56年4月下旬，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追加基本建设投资20亿元，受到了周恩来等多数人的反对，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周恩来又找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很生气，不久，他就离开了北京。^⑧

6月，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送审稿上，毛泽东批了“不看了”三个字。后来他在南宁会议上解释说，6月20日的社论是骂我的，因为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骂我的东西为什么要看？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没有反对周恩来提出的安排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⑨对反冒进进行了含蓄的批评。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指责反冒进，是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在讲话中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指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

造问题上的右倾”。^①这里，他把由于改造过急过快引起的党内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非议和农民的闹退社风潮等，归咎到反冒进的头上。

通观毛泽东的有上述内容的这篇讲话，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反冒进的指责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是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出现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国内各阶层对中共工作的不满以及由此而来的罢工、罢课、闹退社等事件。在毛泽东看来，在1956年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公开纠正自己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无疑是给反对派提供进攻的口实。因此，按照“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定势，反冒进便难逃被指责批判的厄运。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时写过说明，他写道：“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②看过这段说明，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在党的工作遭到非议之时，特别是在反右派斗争后，对反冒进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判。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扩大）全会上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指责。他说：去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③“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这个‘40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④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当时在莫斯科）亲自审定的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

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公开批判了反冒进。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在莫斯科审定的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按照八届三中全会的调子，对反冒进作了进一步的批判。社论说：“1956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但是，“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对于11月13日的社论，毛泽东是非常欣赏的。他在1958年5月26日写给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信中说：这篇社论“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958年1月，在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反冒进的调子严重升级。他指出，1956年的反冒进，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给群众泼了冷

水，泄了气，招致了右派的进攻，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真正的左比右好。他警告，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 50 米远了，今后不许再提反冒进。会上，毛泽东还把《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和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的有关内容，作为反冒进的“错误”材料印发，并印发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借以批评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于反冒进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还拿着他非常欣赏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质问：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因南宁会议的与会者较少，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者也没有全部参加（陈云未参加），因此，为了使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判能产生应有的影响，1958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正副书记和军队有关负责人等共 165 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了南宁会议批反冒进的精神，在党内高层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作了多次讲话，再次批判了反冒进。他说，1956 年的反冒进，吹掉了多快好省、促进会和 40 条纲要，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在领导方法问题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用那一